



悲剧精神的审美超越

——21世纪军旅文学的一种观察 □傅逸尘

翻检世界战争文学经典,悲剧精神往往是一部作品是否深刻厚重、是否具有恒常魅力的审美标志。而在中国当代军旅长篇小说的审美范式中,悲剧精神的淡薄和缺失始终为研究者所诟病——难以摆脱的意识形态色彩,跳脱不出的庸俗化写作模式。书写战争却不正视战争对人性的戕害、对肉身的毁灭,不探究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摹写军人却忽视对人的心理、灵魂、命运的哲学思辨和人性探寻;张扬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同时,却遮蔽了战争历史的悲剧底色。可以说,悲剧审美意蕴的稀薄在相当程度上狭限了当代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空间和精神容量。

悲剧意识是对人的悲剧性命运的认知,而悲剧精神则是对现实人生悲剧境遇的超越,进而在精神上达至一种自由、顽强的生命境界。悲剧精神的实质就是生命之韧性与抗争之不屈——在困境或灾难中坚守信仰,不放弃对未来的美好追求,为了实现理想而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魄。悲剧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反抗,困境中和抉择时往往容易凸显和升华人的存在价值、人格力量、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在世界战争文学经典中,不仅有战争和军人、胜利和失败,还有战争笼罩下的人生悲剧、灵魂堕落和人性扭曲,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静静的顿河》《永别了,武器》等;而在新时期之前的军旅长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乐观主义的胜利、革命大团圆结局以及“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历史的转折以及战争带来的巨大牺牲和隐匿其间的悲剧内涵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遮蔽掉了。

探索人性的内在深度

进入21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悲剧意识开始觉醒,作家们自觉强化了对悲剧审美意蕴的挖掘和表现力度。创作观念的嬗变,使得军旅长篇小说更加深刻地反映出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苦难,更加真切地呈现出中国军人在面临时代转型与和平考验时的精神困境与命运遭际,因而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饶的精神空间。21世纪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在悲剧审美、悲剧表达和悲剧精神的建构方面逐渐走向深入和成熟,注重在错综缠绕的人性维度中开掘思想深度和哲学内涵,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显著增强。

所谓的人性并非孤立和静止的,而是随着个人的认知经验和社会演变而发展变化,始终处于动态的过程中,并与广阔的外界现实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外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在价值信念面临两难抉择和现实考验的境况下,灵魂的自审与斗争常常是激烈而残酷的,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由此体现出来,人性也因此而彰显出深度和广度,人性的悲剧往往就是在难以言明的矛盾困惑和无法做出的价值判断中诞生。

21世纪以来军旅长篇小说更加关注人性的内在探索,注重还原军人的生命本色,展现他们真实的精神状态和心路历程。

英雄人物对历史的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反过来也成就了英雄的功名;然而,有没有被历史的沉沙掩盖的英雄呢?回答是肯定的。历史创造了英雄,也同样制造着英雄的悲剧。21世纪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不再回避战争中的屠杀和血腥;而是努力发现曾经被历史遮蔽的真相,挖掘那些被尘封的英雄。在徐贵祥的《高地》中,老首长刘界河说,所有的历史都会留下说不清楚的东西,他举了一个例子:红军时期一个团在即将突围时,接到密报说内部出了奸细。这让团长政委犯了难,抓吧,证据不足;不抓,又怕真出问题。团长政委决定,把这几个人毙了。即将行刑时,一个“奸细”为了给部队节省子弹,请求自己了断,一头上碰死在石头上。团长说,同志们,也许你们是冤枉的,可是情况复杂,没工夫调查,如果你们是清白的,那就算为革命牺牲了。被历史遮蔽甚至吞噬的英雄悲剧频频上演,却少有作家关注,于是英雄便被抽空并纯化为历史的胜利者。

自古成败论英雄,但成敗毕竟不是可以随意涂抹的,即使时过境迁,英雄的灵魂终须安置妥当。《高地》就是围绕着一段扑朔迷离的战斗历史展开的。双榆树大捷一直是作为光荣战例被载入荣誉史的,有很大一批干部也是因为双榆树大捷的战功而实现了人生的转折;然而,谁成想这却是一场失败的典型。英雄用生命赢得的战斗,日后却成了后人追功求利的工具。英雄与历史的关系远没有我们想象中单纯,复杂、动荡而令人心生恐惧和疑虑的历史造就着英雄的辉煌,不经意间埋下了英雄悲剧的种子。

在战争中体现军人的终极价值

军人的使命就是保家卫国、以牺牲和奉献赢得战争的胜利,换取国家和民族的和平安宁。和平既是对军人的最高褒奖,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军人的埋没。和平年代的军人所面临的职业困境、情感困境和人性困境又是怎样的?21世纪以来军旅长篇小说在反映和平年代的军旅现实生活时,不再是空泛化、模式化地表现军人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是体现出思辨的深度与力量。

对军人来说,只有战争才是自己的归宿,只有在战争中才能体现出军人职业的终极价值。战争渴望、战斗激情凝结成一代代军人难以释放的战争情结。在马晓丽的《楚河汉界》中,周东进所在的部队到南部边境轮战,一直钻猪耳洞,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这使他很郁闷。当接到主攻395高地的命令时,他两眼放光。“周东进激动不已,他只觉得一种压抑不住的激情在胸中汹涌澎

湃地冲撞起来,充盈着他的每一根血管,弹拨着他每一根神经。一种自幼就熟悉的冲动使他周身燥热,坐立不安,恨不能立刻开战,打一场功垂史册的好仗。”这就是军人的职业理想,他们时时刻刻思念那战争女神,甚至愿意献出生命。为此,他们忍受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精神煎熬,拼尽全力对抗平庸,最终却又无可避免地流于平庸的悲剧命运。

一直以来,军队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融入庞大的军队,军人就是一种符号。个体生命、个性化存在似乎从未成为过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主流。不过对于社会而言,每一名军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对于家庭来说,每个军人都是鲜活的,不可替代的惟一。因此,21世纪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更加重视军人个体的生命经验,直面他们的精神困境。除了职业的限制和困惑,军人也拥有自己的情感生活。当一个善良、正常人的情感需求被剥夺而无法实现时,人性的情感悲剧就在所难免。军人的家庭在经济和物质的浪潮中面临诱惑和考验,军人边缘化的职业和清苦的生活被讥笑和不解,他们能否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攀上精神的高地、立起价值的标高呢?事实上,我们常说的“人在军旅”,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选择,它已经成为军人生命的选择、价值的皈依和精神的寄托。这种浓得化不开的军旅情结既蕴含着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也隐藏着军人在职业选择中的精神危机,其中亦蕴含着丰富的悲剧性审美元素。

在衣向东的《一路兵歌》、王秋燕的《向天倾诉》、韩丽敏的《将军楼》等现实题材军旅长篇小说中,没有战争的残酷血腥、没有历史的沧桑厚重、没有慷慨悲壮的英雄豪气,有的只是和平年代普通而又平凡的军旅生活。《一路兵歌》的故事围绕着北京的一个使馆区的勤务中队展开。中队长、指导员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基层带兵人,他们长期和妻子两地分居,独自一人坚守在军营中,放弃了种种天伦之乐。指导员的妻子是个下岗女工,天天盼着能随军到北京功与丈夫团聚,可是就在愿望即将实现的时候丈夫却不幸得肝癌去世了。平凡的军人、卑微的死亡,可是谁又能说他不是一个称职、敬业的军人?在《一路兵歌》中,没有战场、没有英雄,有的只是普通的人、平凡的军人。军营是他们热爱的地方,是他们实现理想价值的平台;可军旅生活所特有的种种限制和现实的困惑也给他们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情感缺憾,这种生死两隔的遗憾又何尝不是苦涩而痛彻的悲剧呢?

军事文学的新女性形象

在21世纪以来军旅长篇小说中,女军人亦成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她们要么是军人的妻子、女儿,要么自己就是军人,抑或两者兼任。在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中,女军人以自己坚韧、



悲剧精神的实质就是生命之韧性与抗争之不屈——在困境或灾难中坚守信仰,不放弃对未来的美好追求,为了实现理想而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魄。

悲剧的魅力不在于苦难而在超越,没有悲剧的战争是不存在的,没有悲剧的军旅是不真实的,没有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是不深刻的。悲剧意识的觉醒已成为军旅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对悲剧精神的自觉建构将使得军旅长篇小说真正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功利,拥有经典的品质和永恒的魅力。

界和战争背景的点缀,不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对军人世界中女性的成长历程、心灵变化和悲剧命运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探索了社会、时代和个性心理等女性悲剧的多方面根源,表达了对女性生命的观照和敬意,展现了女性坚韧的心灵与崇高的精神。

战争带给她们的除了肉体的痛苦,还有种种精神上的折磨。对于女性而言,爱情的悲剧对她们青春的扼杀、灵魂的戕害似乎更加致命。在英雄军人的爱情生活里,女性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她们向往自由、美好的爱情和理想的伴侣,却无法摆脱组织的安排;从封建婚姻逃出来,在枪林弹雨中追求自由,却又不得不面临新的包办婚姻,婚姻的悲剧在历史题材军旅长篇小说中比比皆是。《楚河汉界》中周汉为了留下后代而娶了于恩华并与她同房,却连她的脸盘都没看清楚,于恩华仅是他发泄欲望和繁衍后代的工具;而他却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妻子的不幸,是女儿川川提醒了他这一点,但他仍然一意孤行。让女儿嫁给自己喜欢的警卫员,从而破坏了女儿自由选择爱情和婚姻的权利,还自以为这是对女儿的疼爱,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制造了两代女性的情感悲剧。在21世纪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中,女性不再是男人世

界和战争背景的点缀,不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对军人世界中女性的成长历程、心灵变化和悲剧命运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探索了社会、时代和个性心理等女性悲剧的多方面根源,表达了对女性生命的观照和敬意,展现了女性坚韧的心灵与崇高的精神。

悲剧的魅力不在于苦难而在于超越,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没有悲剧的战争是不存在的,没有悲剧的军旅是不真实的,

没有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是不深刻的。不朽的传世名著大都是悲剧,有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和鲜活的悲剧人物,而缺乏悲剧审美空间的军旅长篇小说是难以成为经典的。21世纪以来的军旅长篇小说从诸如历史的、现实的、女性的等不同层面切入,展现了一代代优秀的中国军人在面临战争与和平、理想和现实等人生抉择时的精神境界和生命状态,建构起具有悲剧审美价值的精神伦理。悲剧意识的觉醒已成为军旅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对悲剧精神的自觉建构将使得军旅长篇小说真正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功利,拥有经典的品质和永恒的魅力。

■新作快评 刘平勇中篇小说《欲说还休》,《中国作家》2017年第7期

婚恋叙事中的价值选择

□宋家宏

中篇小说《欲说还休》写的是婚姻与爱情,作者刘平勇采用平实、朴素的叙事,讲述凡俗人生的故事。小说的叙述者我——英子,正和丈夫闹离婚,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病重,话都说不清楚了,含混中却念叨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父母平素相亲相爱,是人们欣羡的情感楷模。为什么父亲在生命垂危之际,却暴露出内心隐藏着另一个女人的秘密?那个被父亲至死不忘的黄水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小说开篇即构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悬念,接下来作者并未直奔主题,解开迷惑,而是展开了父女两代的婚姻与爱情书写。这一巧妙的构思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原因。

小说展开的内容包含着两条线索,一是解“谜”,父亲心中的黄水仙究竟是谁?这两条线索的叙述主要围绕着父亲与母亲的人生经历、情感追忆,以及寻找黄水仙其人。这两条线索构成了小说的显性结构,但作者着墨并不多,许多内容是回忆与侧面描写完成的。二是英子自己的家庭生活变迁,包括英子面对艰难生活的拼搏与努力、丈夫的无能与堕落、与女儿的冲突。两条线索共同展示了社会变迁中,一个小县城的丰富景观,写得鲜活、生动,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可以看出作家对他所写生活极为熟悉,两条线索的交织也自然流畅,不露痕迹。

一部现实主义的中篇小说,能写活一两个人物,使之具有鲜明生动的个性特征,从中能看出某些人物的影子,引发读者的思考和琢磨,可以说就达到了小说写作的部分目的。小说《欲说还休》的人物塑造很有特点,涉及到的几个人物都有其生动之处,作者在人物刻画方面显示出了其写作20余年积累的艺术功力。

在这些人物中,我以为父亲形象是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这一人物作者着墨并不多,却很生动,有个性,且有心理的深度。小说中的父亲留给读者的表层印象是重病中躺在床上,却仍然含混不清地不断念叨一个陌生女人的名字。但读完小说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是一个对自己的生活有梦想的人,也是一个脚踏实地、不向命运屈服的人。他把自己的婚姻与爱情有追求、有期盼,黄水仙在他处于困境之时帮助过他,他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遗憾的是一些漫画化,却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出生于大富人家,但却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死要面子,一无所能。他只能被体制养起来,表面风光其实平庸地了此一生,就这样成为了父亲的梦中情人,或许这也是父亲对她唯一的报答方式。

当父亲明白自己卑微的处境不可能实现爱情的梦想时,能够发乎情、止乎理,把“女神”永远存留于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能忘却这段情缘。他选择英子的母亲完成了自己的爱情与婚姻,因为妻子与他心中的女神有共同的长相与神情——这看似对英子的母亲有所不公,但父亲的确把一生的爱都给了这位妻子。所以,他们的夫妻关系才能成为乡亲们敬仰的对象,英子的母亲也深为感动。

刘平勇在对夫妻关系的生动描写中,其实已经从客观意义上提出了问题,引领读者思考:一个男人的一生真的只能爱一个女人吗?刘平勇在琢磨这个问题时,又有所犹疑,所以他把英子父亲对黄水仙的感情在小说结束时更明确地引向了“报恩之义”上了。我以为,如果更深入地往“情”的复杂性上开掘,可能会使小说人物的心理更有深度,也更有特色。相比较而言,作家着力描写的人物英子有性格却缺乏心理深度,她的坚强描写表面化,最后的屈从与其坚强的性

格不大吻合,其间的转换少了些艺术描写的逻辑。

此外,围绕两条线索,小说所展开的内容相当丰富,父女两代都要面对企业倒闭、下岗的生活突变,父亲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手艺,依然能过着安然平静的生活。因为有爱,父辈的婚姻牢不可破,清贫并没有改变家庭的温馨。女儿英子也遭遇了下岗的困境,她坚强奋起,丈夫李寿喜却一蹶不振,最终滑向堕落的深渊。尽管李寿喜这个人物有些漫画化,却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出生于大富人家,但却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死要面子,一无所能。他只能被体制养起来,表面风光其实平庸地了此一生,一旦下岗就只有沉沦这一条路。

在社会的转型时期,我们见过许多李寿喜一类的人。他与英子的离婚是必然的选择,他们的婚姻没有共同价值观作为基础,也没有产生不可分离的爱情。一开始,英子欲离婚而不得,李寿喜缠住了她,他要的是英子的钱,也不会对女儿尽应尽的责任。这些描写使一篇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拓展了内部的空间,写出了人在面对生活突变、遭遇困境时的选择,揭示了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

人性在平静而常态的生活中是不大容易暴露其深层内涵的,而在突变的非常态下,就会自然地显露出来。刘平勇把两代人的家庭、婚姻置于非常态之下,思考人性的维度。他赞美老一代的勤奋、忠诚、相亲相爱,面对困境有所作为。而对无所作为、得过且过的态度是彻底否定的。小说名为《欲说还休》,似乎包含了作者自己还有些说不清楚的意思,其实小说已经说得很清楚,甚至有点过于清楚了。

短评

坚守与求新

——戴希小小说集《其实很简单》印象 □郭虹

戴希的小小说以其多样的题材、鲜明的主旨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当代文坛上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他的“在场性”表达决定了对历史、对现实的审视深度,也决定了他作品的价值。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使他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但是,风格即个性,风格即僵化。一位作家的创作风格一旦形成就意味着他的作品有了自己的个性,但同时作家也有可能囿于某种模式无法超越而陷入僵化。戴希深谙此道,他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一面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原则,一面又大胆探索求新求变。《其实很简单》(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共入选戴希小小说创作各个时期的优秀作品47篇,集中地体现了戴希在几十年小小说创作道路上的坚守与探索。

戴希的一些作品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读者甚至难以察觉其对生活的提炼和加工,具有一种白描现实主义的风格。艺术的真实性可以说是小说的生命,也是作家孜孜以求的效果,但由于各人对生活认识理解的不同而导致对事物本质及发展规律揭示的差异。《记得那时》讲述的是一个孩子捡到一笔“巨款”之后的故事,从笛笛发现“路上躺着七元钱”到他向曾老师上交3元,到老师如何“赞许”、校长如何“推介”、学校如何宣传、他如何反省自责、又如何“掉钱”这一过程真实得就像身边发生的一样。作品中的笛笛虽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但他的心理、行为已经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又极符合儿童的特点。

除了真实地呈现之外,戴希的作品还有着白描现实主义的简洁凝练,但同时又不失铺排跌宕。小小说有着小说的共性,需要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而凝练也正是小小说短小的篇幅所限,虽铺排跌宕却不能汪洋恣肆,因此,戴希将诗歌创作的经验借鉴过来,形成了他作品的简洁之风,虽然简洁却丝毫不影响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都赢了》是一篇难得的高度凝练之作,小说写的是某厂一名叫“小秦”的司机如何与修理厂厂长勾结做局,从“临时工”摇身一变而登上“人事科科长”宝座的故事。作品前半部分虽为其表,却逻辑严密,没有丝毫破绽,后半部分是为其里,也就是那个

“局”,读后让人不禁被小秦的智商折服,同时又为小秦等的贪婪而忧愤。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局”,但作者却将其浓缩为340多字篇幅,其前因后果,逻辑清楚,映射出表面光鲜时代背后的龌龊。

《其实很简单》也是一篇颇具现实主义功力的作品,小说集以此为名亦颇具深意。世间事原是简单的,只看你如何看待、如何对待。一位平时怕踩死蚂蚁的男人却能在危急时刻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按常理推论这背后一定掩藏着什么隐秘的原因。但随着记者的深入采访,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理由被揭示出来,那是一束从一颗清澈透明的童心中发出来的人性美的光芒,也是足以使一位懦夫变成勇士的力量。这种手法让部分读者觉得少了回味,但有些事情只有抽丝剥茧才能直逼真相——这种严密的理性思维干预也是戴希作品现实主义的一大特色。

迄今为止,戴希公开发表微小说800多篇,同时在诗歌、散文、杂文等领域也有不错的成就。可以看出,他在写作中试图打破文体之间的藩篱,将各种表现手法综合运用到小小说创作中,探索小小说创作的新方法、新途径。

在体式上,戴希不断尝试改变小小说原有的故事结构,《祝你生日快乐》《红狐狸》与“北方狼”的故事作者安排了三四种不同的结局,这一结构表面上看只是打破了原有的故事框架,而实际上是面对复杂的现实,打破了固有的思维方式而导致——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视角看会呈现不同状态,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一探索虽有前人经验借鉴,但却很契合当今这个多变的社会。诗体小小说《婚检风波》也是一个大胆的试验,虽然有着诗歌的分行排列和思维跳跃,但故事情节完整,主题集中。诗风亦庄亦谐,颇具讽刺意味。戴希常常借助一个故事来阐明某种道理,《童心》《天堂·地狱》就属于这一类。寓言小小说源远流长,但贴近时代的作品却不多。也许有人认为有失浅显,但这种以极少文字寓深刻道理的作品却能给人清清浅浅的澄澈新鲜之感,使人愉悦中受到某种启迪。因此,戴希的这种实践是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的。